

# 評《與機器一起思考》

## A Review on “The Ethics of Thinking with Machines”

尹 潔

Yin Jie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first reiterate the views of Lyreskog et al. and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discussing ethical ques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BT—a topic that has clearly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China. Second, given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applied ethics, I focus on what Lyreskog et al. refer to as a “seismic shift in how we conceptualize much of what we take to be core values in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Lyreskog et. al 2023, 11–34) to explain how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progress of ABT eth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 agree in principle that frameworks aiming to offer ethical guidance in ABT situations should use ontologies and taxonomies that allow for conceptual flexibility and redesign. These frameworks should also be subjected to philosophical critique and modified in light of scientific practice.

---

尹 潔，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上海，郵編：200433。  
Yin Jie,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中外醫學哲學》XXI:2 (2023年)：頁 59–6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2 (2023), pp. 59–63.

© Copyright 202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Lyreskog 等人的文章以腦機介面為切入點，道出了人工智能與神經科學融合交叉視野下的諸多倫理問題，並有針對性地給出了在倫理和哲學層面需要關注或重點討論的概念性議題。與中國現有諸多關注腦機介面倫理問題的文獻相比，Lyreskog 等在文章中更為側重凸顯分析和處理應用倫理問題的概念框架，文章討論在 ABT (AI-BCI Technology) 技術的使用下，如何圍繞那些看似傳統的哲學倫理學諸概念，推進技術倫理問題的解決。在本文中，我首先希望呼應原文的觀點，強調 ABT 技術背景下倫理問題的特殊性，其次，我將從我對於原文章中一些個別觀點的理解談起，藉此闡釋在當代中國應用倫理的現狀和背景下如何實現 ABT 技術倫理的創新性進展。

ABT 技術下的新倫理問題，源於神經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合併使用造成了倫理上尤為敏感的區域。除了在神經病學和精神醫學的臨床實踐中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所造成的倫理關涉之外，腦機接口技術的使用又帶來了更為複雜的倫理問題，這使得原本單純在神經倫理領域或僅僅是人工智能倫理領域內的研究都顯得不夠充分。相對而言，人工智能倫理更為關注演算法相關的安全、透明和公平性問題，而神經倫理的關注重點則與傳統的生命醫學倫理更為接近，集中在受試者保護，尤其是神經技術和藥物增強對於人類精神的影響等方面，並且，值得注意的是，神經倫理當中被 Roskies 稱為“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的分支與當代哲學的交互，又使得倫理學家得以識別哲學在應用於具體實踐時的不足和裂隙所在，藉此反向推進哲學倫理學自身的變革。

然而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如何實現這種變革。Lyreskog 等人的文章寫到：“如果生命倫理學家想要在這一個域保持相關性，他們應該為我們如何概念化醫學和衛生保健領域的核心價值的巨大轉變作好準備”(12) 我的疑慮在於，生命倫理學家希望在醫學和衛生保健領域保持相關性的需求，究竟僅僅是倚重於領域內部的觀念轉變，還是涉及到其他層面的努力？誠然，對於醫學和衛生

保健領域而言，當今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巨大潛能雖然已經引起了業界廣泛的關注，在其倫理相關問題的重要性體認上則有所欠缺。但如果我們將這種認同的缺失簡單地歸因於中國社會當中普遍和長期存在的實用觀念，恐怕很難找到這其中根本的原因，也很難從倫理學的專業視角來給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對於當今中國而言，生命倫理學家之於 ABT 技術倫理的相關性可能主要地不在於確認核心價值的轉換，而是思考如何為這樣的轉換做出實質性的關聯。換言之，儘管 ABT 技術應用下諸如自主性、精神完整性、身分認同、數據隱私保護與控制這些問題幾乎會無差別地成為全球各國關注的倫理重點，同樣地，我們也會同意作者所言的——ABT 背景下確實需要發展出所謂具備“概念靈活性”。由此也可看到，一些與之相關的問題未有在本文中得到充分討論，諸如腦機介面情況下道德責任的歸屬、道德運氣之餘責任的影響等，這些問題與通常集中在受試者安全或隱私保護的關注重點有所不同，其解決或推進更為倚重於作者強調的“重新設計的本體論和分類法”，諸如如何識別和定義腦機接口技術應用下的“行動”、“責任”、“責備”，在當代行動哲學和傳統規範倫理學中的資源應該能為這些概念在全新語境中的定義奠定基礎，這些緊密相關的概念工具也未有在文章中得以討論。

作者談及在 ABT 技術應用下“自主性”涵義的變化，體現了賦予當代應用倫理學概念內涵的來源，換言之，技術與人交互的經驗不確定性帶來了概念的靈活性。即便這不意味著像自主性這樣傳統的倫理概念改變了其基本的內涵，但至少，在倫理學家習慣於運用自主原則來對於技術的使用做倫理評估之時，未必有依據能斷定在 ABT 技術應用的具體場景中自主性到底意味著什麼，以及，正如文中提及的，由於 AI 的認知整合過程，患者很可能無法辨別一個行動決策是否由自己做出，但這一事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損傷了一個人的自主性，因為究竟哪些證據可以被採納並用於顯示所謂自主性，這同樣也是不清楚的。文章在處理自主

性的這個問題上，頗為系統性地將與之緊密相關的一系列同樣需要重新在 ABT 技術應用語境下進行考察的概念一一呈現出來，諸如精神完整性、自我意識和認同、精神隱私權等，並鼓勵讀者與之一道面向技術時代的未來，採取開放的心態。這種開放心態，很明顯是針對習慣於對於概念做出核心甚至是相對固定的界定的哲學倫理學家。而對於應用倫理剛開始綻放其生命力的中國學界而言，這一點提醒我認為尤為重要。

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雖然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看，文章未能對涉及 ABT 技術應用的倫理諸關鍵概念展開充分的闡釋，它仍凸顯了一個對於中國語境而言尤為重要的洞見，即，儘管倫理分析需要在具體的場景和案例中個別地開展，一個通盤性的倫理框架仍然是必要的，甚至說是首要的也不為過，尤其是，考慮到需要確認在整個技術滲透的過程當中，有哪些倫理介入的關鍵環節。像自主性、精神完整性、自我認同、精神隱私、增強與治療等倫理概念，必然不僅僅會成為思考和處理 ABT 技術倫理問題的抓手，也會作為示例成為當代中國應用倫理領域的通用概念工具。這是因為所有實踐問題的分析都會需要借助於那些對於哲學和對於生命倫理學而言都是必要的核心架構。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萊瑞斯科、佐赫尼、辛格、薩烏萊斯庫：〈與機器一起思考：腦機介面技術〉，《中外醫學哲學》，2023年，第XXI卷，第2期，頁11-34。  
David M. Lyreskog, Hazem Zohny, Iliana Singh, Julian Savulescu. "The Ethics of Thinking with Machines: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 no. 2 (2023): 11-34.
- Rainey, Stephen, Hannah Maslen, Julian Savulescu. "When Thinking is Doing: Responsibility for BCI-Mediated Action," *AJOB Neuroscience*. 2020 Jan-Mar;11(1):46-58. doi: 10.1080/21507740.2019.1704918.
- Roskies, Adina. "Neuro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ium," *Neuron*. 2002 Jul 3;35(1):21-3. doi: 10.1016/s0896-6273(02)00763-8.

Vukov, Joseph Michael and Kit Rempala. (2020) “BCI-Mediated Action, Blame, and Responsibility,” *AJOB Neuroscience* 11, no. 1 (2020): 65–7, DOI: 10.1080/21507740.2019.1704929